

明清

MINGQING ZHEDONG

浙东经世实学通论

JINGSHI SHIXUE TONGLUN 潘起造 编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明清浙东经世实学通论

潘起造 编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浙东经世实学通论/潘起造编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5. 7

ISBN 7-80602-913-3

I. 明... II. 潘... III. 实学—研究—浙江省—明清时代 IV. B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149 号

书 名 明清浙东经世实学通论

作 者 潘起造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吉祥文化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 315000)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40 千

版次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2-913-3/B·9

定 价 30.00 元

序 言

葛荣晋

今年10月底,中国实学研究会与宁波市委党校等单位成功地举办了“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潘起造先生将他的《明清浙东经世实学通论》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为这部著作写篇序言。潘先生的名字我在2004年4月杭州会议上虽早已知道,但我同他的第一次见面则是2004年11月在长沙举办的“第八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在会上,我们集中地交谈了筹办宁波会议的事。他的朴实无华的语言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提出这一要求,我尽管很忙,还是愉快地答应了这件事。回到北京后,我在百忙中用了二十多天时间,认真地阅读了这部著作,从中获益颇多,这是一部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好书。

一是转换研究范式,开创了浙东学派研究新视角。潘先生对明清浙东学派的研究,既不采用传统的“理学研究范式”,也不采用现代的“两军对垒研究范式”,而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觉地将最新的“实学研究范式”引入到浙东学术研究领域。正如他所说:“本书的主旨是从经世实学的意义上对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作一历史的、比较详尽的思考。”从经世实学角度探讨浙东学派个别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之,而从整体上把握浙东学派的经世实学体系及其现代价值,这部著作在全国要算是第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价值。

二是从浙东事功学派与阳明心学合流的层面阐述明清浙东学派的思想渊源,是颇具挑战性的切入点。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由于

“两军对垒研究范式”的思想影响,将宋代事功学派视为黄宗羲等人的思想源头,认为顺理成章;而把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与清代浙东学术联系起来则难以理解,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两者对立起来。潘先生抛弃了这一习惯性的错误做法。他认为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固然有其虚学成分,同时它也含有丰富的实学内涵。明清浙东学派所阐扬的经世实学,“正是通过阳明心学把事功学与心学融合在一起的结果”。所以,潘先生在这部著作中不但详细地剖析了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而且还把浙东经世实学通过刘宗周与阳明心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从王阳明到刘宗周再到黄宗羲的合乎内在逻辑的发展过程。这一新的切入点,不仅克服了以往那种僵化的对立思维方式,而且真实地展示了明清浙东实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极大地向前推动了浙东学术的深入研究。

三是深入地探讨了明清浙东学派的科技实学。在近年的明清实学研究中,有的学者不同意将科学技术纳入实学范围,认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东西。如将它纳入实学范围,就被视为一种“泛化”行为。我不赞成这种“窄化”的说法。所谓经世实学,除了社会政治层面的经世之学外,还应包括“实测之学”,即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它是经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这是“经世实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科技实学是从价值层面而言,并非就具体操作层面而言。潘起造先生在黄宗羲、万斯同、黄百家等章节中详细地剖析了他们的科技实学,从而补充和丰富了明清实学的新的内涵,是对明清实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四是从浙东地域文化的特殊背景去认识和评价浙东经世实学的内涵和现代价值,也是一个令人称赞的新的视角。潘起造先生对浙东实学文化的透视,是把浙东实学文化的大传统(即孔、孟开创的儒学传统)与小传统(即由浙东特殊地理环境所孕育的海洋文化传统)、远传统(即古越文化传统)与近传统(即由明清浙东地区商品经济所形成的文化理念)结合起来,从地域文化研究视角诠释明清浙东学术文化,从浙东学术文化解读浙东学术精神,并在与湖湘文化、岭南文

化的比较中,把握浙东经世实学的历史定位,揭示它对现代浙江的经济发展、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从而肯定它的现代价值。这一新的视角,为我们评价中国古代实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评判标准和模式。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科学方法。

以上是我阅读全部书稿后的一些感想。披读之余,略述所感,以为之序。

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静园冷香斋

2005年12月25日

前 言

本书的主旨是从经世实学的意义上对于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作一历史的、比较详尽的思考。所谓经世实学,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宋明以来的儒家文化中关于经世致用的学说和理论观点。所谓经世致用,就是指学者(古代称士人)面对现实,运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人文精神和学风。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在相同的政治大环境下各地会有不同的发展状况?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区域内的人文因素,于是大家认识到了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价值取向离不开区域文化的支撑。加强区域文化建设已越来越被各地奋发有为的领导阶层以及社会各界所重视。因此,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宁波人,现在大力加强对于浙东学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浙东学术”这一名词的源头可追溯至清初黄宗羲那里,是黄宗羲最初使用“浙东学术”的概念。自他以后,中国思想史上就有了“浙东学术文化”这一概念以及对它的研究。在 20 世纪,关于浙东学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在 20 世纪前期,有章太炎的《清儒》,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周予同的《第四期之前夜》、《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陈训慈的《清代浙东之史学》,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但研究内容大多侧重于浙东史学。对于 20 世纪的浙东学术文化的研究,当代学者吴光先生的看法是:“对浙东学派中

个别人物(例如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多一些,而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则比较少,系统性研究的专著就更少”。^①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整个中国大陆学界,除了一些教科书和历史性著作外,有关浙东学术的研究几乎没有论著问世,对于它的宣传和弘扬则更是无从说起,以致当时即使浙东地域范围内的人对它知之也甚少。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重现生机,对浙东学术文化的研究愈趋活跃,这不但成为我国国内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我们浙江区域内,还成为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浙东学术的精神首推经世致用和民族精神,这在各个时期学者那里都有提到。梁启超认为“史学经世”是浙东学术的精神,他说:“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②周予同指出浙东史学派的两大特点是“严种族之别”和“尊重历史”。他说:“黄宗羲、万斯同辈努力于宋明末叶掌故的搜辑,都不过凭借史实以引起后死者的奋发。”这两大特点就是经世精神和爱国精神。陈训慈的《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有专章论述浙东史学的精神。他把浙东史学的精神概括为:博约之精神,躬行之精神,经世实用之精神,民族思想之精神,不立门户与大公之精神。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运用实学的理论观点,充分而系统地展示明清时期浙东学术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

把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定位于经世实学,这是吸取国内近20年来儒学研究成果后形成的一个说法。实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到明清时期的一个理论形态、重要的文化思潮,本不为中国现代学者所瞩目,虽然梁启超、侯外庐等著名学者提到过“实学”一词,但并未做过系统研究,更未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形态。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在韩国、日本实学的影响下,启动了对实学的研究,由此极大地推

① 万斌主编《浙学研究集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进了人们对儒学文化当代价值的认知,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对实学的研究,正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一个新兴的领域而被人们广泛关注。从实学的角度来阐述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的思想内涵,就是这样的一种学术探索 and 理论尝试。

需要申明的是,本书对于明清浙东先哲学术思想的解读,主要是依赖于后代学者研究成果,特别是引用了当代著名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而直接从这些先哲的原著中发掘和提炼出来的东西并不多,这样做,虽然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观点能够立足于现有的高点之上,但却影响了本书学术的原创性。因此,本书的写作,与其说是著述,还不如说是辑要更为确切。同时还要说明的是,陈确和张履祥是刘宗周的学生,他们学术思想的渊源与浙东学术文化紧密相连,因此本书也把他们的学术思想纳入了本书范围。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宁波大学方祖猷先生的热心指导和本校梁一群老师的帮助。书稿初成后有幸得遇中国人民大学博导、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葛荣晋教授,张践教授和浙江大学李明友教授,就十分冒昧地恳请他们审阅斧正,他们不弃后学浅薄,花了许多时间仔细批阅,从书稿的编写体例到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一一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人在学术上获益颇多,葛教授还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使拙著大为增色,在此向他们一并致以真挚的感谢。

作者 2006 年 6 月

目 录

序 言	葛荣晋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经世传统和明清经世实学	(1)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文化传统	(1)
二、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及经世实学思潮的兴起 ..	(7)
第二章 浙东学术文化和明清浙东经世实学	(22)
一、浙东学术文化的内涵及其历史流变	(22)
二、宋明时期浙东学术文化的兴盛和发展	(28)
三、阳明心学的经世观念及明清浙东经世实学思潮的兴起 ..	(37)
第三章 刘宗周“慎独”的诚意实学思想	(52)
一、以“意”为本的诚意慎独说	(55)
二、“离气无理”的气实体论	(59)
三、以“气质”为本的实学人性观	(62)
四、“王道本乎人情”的实学道德观	(63)
第四章 黄宗羲“学术所以经世”的实学思想	(67)
一、“盈天地间皆气”的实学世界观	(69)
二、“盈天地间皆心”的实学心性观	(72)
三、“在万民之忧乐”的实学政治观	(76)
四、使天下人“各得自利”的实学经济观	(81)
五、“经世应务”的实学史学观	(85)
六、“中西会通”以求超胜的科学观	(87)

第五章 万斯同“经世儒者要务”的实学思想	(91)
一、“经世之学，儒者要务”的实学思想	(93)
二、“探究兴亡，劝善惩恶”的经世观念	(96)
三、“有意于生民”的民本主义新思想	(103)
四、“兼通两家而折其衷”的中西汇通思想	(108)
第六章 全祖望“史以纪实”的史学经世思想	(113)
一、“不伏命”的人生观及“学道爱人为先务”的处世观	(115)
二、“道以躬行重”的经世治学观	(120)
三、“史以纪实”的史学观	(123)
四、“大节第一”的民族爱国精神	(126)
第七章 章学诚“寓致用于学术”的史学经世思想	(130)
一、“学问所以经世”的学术观	(132)
二、“六经皆史”的史学观	(136)
三、“事势自然”的历史观	(141)
四、“不负我生”的人生观	(145)
第八章 黄百家的科技经世实学思想	(148)
一、对世界本原物质性的科学思考	(150)
二、“试验立决”的科学实证思想	(154)
三、辩证的真理观和世界观	(157)
四、以科学方法注经论史的学术精神	(159)
第九章 朱之瑜“经邦弘化，康济艰难”的经世学说	(163)
一、“实理”“实行”的哲学思想	(166)
二、“实利”“实用”的事功社会学	(169)
三、“利民”“爱民”的社会改革论	(172)
四、“通经致用”的史学观	(176)
第十章 潘平格“致知格物”的求仁经世说	(179)
一、“以天下生民为念”的豪杰经世说	(181)

二、“浑然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学和谐论	(185)
三、保四海、平家国的“致知格物”修身论	(190)
四、“笃志力行”的道德实践论	(194)
第十一章 陈确“人欲正当处即天理”的实学性理说	(197)
一、无神论的世界观	(199)
二、“理寓于欲”的人性论	(203)
三、“天理只从人欲中见”的理欲观	(206)
四、“知行并进”的知行观	(208)
第十二章 张履祥“当务经济之学”的耕读治世说	(213)
一、“当务经济之学”的治生观	(215)
二、以勤俭和劳动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217)
三、“艺谷、栽桑、育蚕、畜牧诸事,俱有法度”的农业管理思想	(219)
四、重视乡治和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222)
第十三章 明清浙东经世实学的地域文化特征	(225)
一、从地域文化解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225)
二、从地域文化解读浙东学术文化	(236)
三、明清浙东经世实学的地域文化特征	(251)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经世传统 和明清经世实学

明清浙东经世实学是浙东学术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学术文化,其作为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最主要的成就是把中华文化中一以贯之的“经世主义”的传统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为中华传统文化从古代走向近代乃至现代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在讨论明清浙东经世实学文化时,首先需要对中华民族的经世文化传统和明清经世实学文化思潮作一基本考察。

明清浙东经世实学文化的产生、发展,是与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经世实学思潮的兴起、发展的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明清经世实学文化思潮在浙东区域文化中的思想硕果,它对于推进明清经世实学文化的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文化传统

经世致用是明清浙东学术最显著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经世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在“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的文化自觉;或者说,明清浙东经世实学是儒学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当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创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主义

“经世”亦即济世。这里的“经”字,在先秦典籍中往往与“纶”字并用,含有“匡济”之义。《周易》中《象传》解“屯”卦说:“君子以经纶。”《周易正义》释曰:“经谓经纬,纶谓纲纶。”《中庸》说:“惟天下至诚,而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经”、“世”并用,首见于道家《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根据该书注疏的解释,经世是典要、规则的意思。《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有人“计日用之权宜,妄经世之远略”。此处的“经世”,则有“经世致用”一词之含义,指出经世者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权宜”之计,而且要有深远的谋略。

“经世主义”一直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是千百年来士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信条。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最早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之一。他在世时,既将经世思想注入儒家经典,又周游列国,企望说服列国之公卿士大夫等上层人士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经世、救世,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之道”,虽为道家《庄子·天下》篇中所最先提出,但它更适合表达儒家的经世思想。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所作《礼记》一书中的《大学》篇,提出三个纲要、八个条目。三纲要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项属内,是教育人们做内圣的功夫;后三项属外,是推己及人,成就外王的事业。内圣外王、三纲八目,可以说是历代儒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其终极目标在外王经世,努力把个人的内在道德外化,从而在社会实践中予以丰富和发展,建功立业,兼济天下。

所以,所谓“经世”,顾名思义,即经邦济世。用《左传》和《周礼》中的话来说,就是“经国家”、“经邦国”;就是指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企求达到天下治平的一种观念。具体而言,它至少包含如下几层涵义:

- 从人生价值上说,以积极入世为基本要求;
- 从处世态度上说,以经邦济世为奋斗目标;
- 从学术功夫上说,以明道达用为最高追求;
- 从道德情怀上说,以舍己奉公为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推崇积极入世、求真务实的人生观,“经世”是传统社会文人士大夫思想构成的重要内容。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士”产生以后,“入世”、“经世”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追求。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治国、平天下,时刻关注国事民瘼、天下苍生,力求通过经世致用,促使“民以安,物以阜”。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可见先秦诸子虽然学思殊途,政见各异,但最后都归结到治国平天下、经邦济世的道路上。即使看似逍遥、超然世外的庄子,骨子里也琢磨着何以“应帝王”。他在《天下篇》开宗明义:“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墨子强调为学、从政必须体察天下“耳目之实”,关注“百姓人民之利”,并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墨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后来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也只有当其用因果报应、惩恶扬善这样的“现世”观念来阐发其所谓“出世”的教义时,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而融入中华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文化,则更可以说是一门经世之学。儒家所追求最理想的道德境界“仁”,其充分的体现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礼记》的《大学》篇有一段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表述,从个人修持入手,直到经邦济世,概括了中国儒学其所固有的经世精神。

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经世主义”日益凸现,治国平天下逐渐成为士人的人生信条与目标。与此同时,经世与致用联系到一起,经世意识通常要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付诸实践,此即常言的经世致用。这种执著的经世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虽有淡化之时、变形之象,却始终延绵不绝,于起伏跌宕之中一以贯之。先秦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追求“内圣外王”,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最高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体而又生动地体现了儒家经世精神。正因为如此,黄宗羲说:“儒者之学,经天纬地。”

经世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与时俱进。自秦汉至晚清,经世观念经过了汉唐、宋明、明清之际和晚清四个发展阶段。汉代儒术独尊,儒家的“通经致用”、“六经治世”便成为经世观念的主要形态。魏晋隋唐时期,经世观念受到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出世”观念的极大挑战。经过与佛、道两教“出世”观念几百年的相激相荡,经世观念在北宋时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学术上,产生了与“经义”之学相对峙的“治事”之学。张载则进一步将经世观念提升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的高度。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开始出现近代转型的时期,也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大动荡时代。这一历史的大变局使经世思潮遇时而兴,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强音,不仅将经世观念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孕育了早期启蒙思想,使经世思潮与启蒙思潮相互交织,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进入晚清,中国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世的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扬和激烈。此时在中西激烈冲突的历史大变局中,经世精神构成近代中国人积极回应来自外部的现代性挑战的动力基础,成为中国文化从古学走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二)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

当代著名学者庞朴先生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按照他的说法:所谓传统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言。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所谓文化传统,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庞朴先生认为: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的一种观念和力量;是人们遵照它而行动,但是又不能意识到它存在的一种精神力量。^①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所传承的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它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这种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基本文化传统。

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经世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数千年来儒家提倡的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虽然,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随着历史运演而不断变化,有受到独尊一统的时期,也有遭遇打击扼制的时期,但儒家入世的基本价值取向亘古未变。儒家的经世精神是永恒的,中国人不论是尊孔还是批孔,儒家文化中所贯彻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基

^① 庞朴:《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